

60752/290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
建设的道路

王启文 郑志鹏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正确建党道路的集中体现。延安整风的基本经验,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整党整风的形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必须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已经为我们勾划了这条新路的轮廓,其特征是: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以思想建设为基础,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1942—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成功范例,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身建设正确道路的集中体现。当前,我们党处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问题亟待解决,研究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探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我们党的一大优点。但是,中国的国情与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革命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点。这样,中国党的建设就必然遇到俄国党的建设所未曾遇到的特殊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业十分落后,无产阶级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人数很少;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党如果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就不能发展壮大自己,就不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从而也就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大量入党又会给党内带来非无产阶级倾向,使党难以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坚强战斗力。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靠背诵马列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也不能照搬俄国党建设的经验,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开创出适合中国党情况的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建设问题。

根据这一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其特征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在党内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非工入出身的党员自觉克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条道路的初步形成,是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创造性地采用整风运动的形式,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使这条道路臻于完善而最终形成。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作为这条道路的典范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彻底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有效地促进了党员思想入党问题的解决,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并形成了党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实现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①,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整风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深刻启示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它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做法,作为毛泽东建党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党的思想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思想建设头等重要的任务。

延安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经过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已经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策略上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但是,限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党还来不及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党内不少同志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还分辨不清楚,教条主义还紧紧地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从而严重阻碍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阻碍了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即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反复地论述了实事求是这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广大党员、干部认真阅读《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和 22 个整风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现状,大大提高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经过整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牢固树立起来,而且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普遍掌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相应的政策、策略的基础。从延安整风后到 50 年代前期,党的事业以高屋建瓴之势蓬蓬勃勃向前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思想路线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同志逐渐偏离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

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必须注意经常不断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第二,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是思想建设的经常性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到延安整风前,党员人数由长征结束时的4万人增长到80万人。这些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②,这就使得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③因此,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中既坚决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主要的歪风,又严厉地批判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号召大家在整风中把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自觉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问题,清理自己的思想,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党员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了。正如李维汉同志所说,延安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④。

当前,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与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一个党员。前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严重侵蚀党的肌体,而我们却放松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致使不少党员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分不清是非,丧失了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条件。这种状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仍然是党内的本质矛盾,我们必须发扬延安整风的传统,把解决党员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抓紧抓好。

第三,抓好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与提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但它的重点,是当时党的高、中级干部,对此,毛泽东同志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⑤鉴于以往的路线错误主要发生在领导机关,鉴于高中级干部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整风中始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重点。

延安整风的准备阶段就是从高级干部开始的。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

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党中央于9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300名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理论，总结历史。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本历史文献集，供高级干部研究党史，总结经验。在延安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带动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纷纷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越来越多，对全党普遍进入整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普遍性整风学习基本结束以后，整风运动又回到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讨论历史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作了一系列报告，指导干部对王明“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和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延安整风运动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是十分成功的，在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中也仍然适用。当前，我们党内存在思想上、理论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身上，而他们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水平、工作作风对党的事业又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党的思想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高中级干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⑥，因此，他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⑦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⑧可见，抓好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和提高，仍然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

第四，创造党内生活的民主气氛，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找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⑩。但是，“左”倾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把党引上了僵化和失败的道路。为了能够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指出只有这样，广大党员才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在延安整风中，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正确的原则，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以求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种民主的

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收到了很大成效，大家既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焕发了干劲；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50年代后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被打上了“左”的烙印，动辄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①”“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②”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回避矛盾，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保持无原则的“和平”。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资产阶级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有相当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放下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效的武器。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建设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对于执政以后党的建设将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党和党的领导人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已经有了较长时期的在局部地区（革命根据地）执政的经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根据地时代已有显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而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如果说，毛泽东同志主要是针对可能出现的骄傲、腐化现象提出警告的话，那么，刘少奇同志则对执政条件下的官僚主义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一文中，他对根据地政权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指出：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就没有权利和资格在全国人民中谈民主政治，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的怀疑^④。无论是骄傲、腐化现象，还是官僚主义作风，其严重的后果，都在于使工人阶级执政党脱离本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丧失其先进性，最终陷于失败之地。因此，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中心课题就是要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正确地代表人民利益，引导人民前进。

为了完成执政条件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工人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方法问题、道路问题。从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看，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沿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办法，所不同的是，在某些整风运动中强调了组织整顿

的内容,因而被称作整党。从1950年至1987年,我们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如本文开头所述,延安整风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的集中体现。但是把整风运动的形式应用于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没有获得延安整风运动那样巨大的成效,没有能够很好解决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中心课题。

第一,建国以后整党整风的积极效果是不巩固的。1950年的整风运动在解决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上,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的。但是,这次整风于1950年底基本结束后,很快,我们党又感到了有再次进行整顿的必要。于是,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就决定要进行整党。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于1954年春季基本结束。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由此开展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我们党共开展了6次整党整风,其频率之高,使党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处在运动状态。新时期整党,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整党后期,即出现了新的不正之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更是暴露了我们党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整党整风所取得的积极效果是有限的和不巩固的。

第二,建国以后整党整风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中已经出现了“左”的偏差,如打击面过大、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法律手段、在“三反”中发生了某些冤假错案等,虽然其中大部分得到了及时纠正,但仍产生了消极影响。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发展中演化成了反右派斗争,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至于1959年的反右倾整风,1964年至1966年社教运动中的整党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则完全是为推行“左”倾错误服务的。这三次运动,一次更甚一次地搞乱了党的思想,打击了大批的好干部、好党员,使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帮派体系得以利用党的错误实行其篡党夺权的阴谋。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建国以后的整党整风运动虽然在改进干部作风,增强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反腐败意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未能有效地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没有达到党和人民期望的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发生了严重失误,加之党内生活不正常,使党的失误逐步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早就揭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这一规律。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党的建设的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延安整风运动其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国初期的两次整党整风其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关键就在于当时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党的政治路线从1957年开始逐渐发生失误以后,整党整风运动也就必然地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还与当时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形成了民主、平等、和谐、活跃的良好气氛是分不开的。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党内,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这种气候下,实事求是的原则无法坚持,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无法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就只能向着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

第二,整风运动的形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首先,整风主要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种形式,在党的路线正确、党内生活正常的情况下,它对于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以及由于思想认识错误而产生的不良倾向是 very 有效的。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万能的法宝用于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在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内存在的问题日趋多样化,其根源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统统归结为思想认识问题。对于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其次,整党整风挟群众运动之声势,对党内不良倾向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其效果容易流于表面化,解决问题不够深入扎实细致。因而,党内的不良倾向往往在运动来临之际收敛一时,运动过后便又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为害更烈。新时期整党就很能说明这一形式的上述局限性。再次,整党整风作为一种党内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一经发动,难以规范,因而容易发生过头行为,容易被党内把持一定权力的坏人所利用,即使及时发现予以纠正,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也往往难以挽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国以后我们党对自身建设是很重视的,花了很大气力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曲折,由于没有找到一条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党的自身建设的状况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增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有效克服不正之风方面,党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全党同志迫切希望我们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

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就为搞好自身建设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同时,开辟出一条正确的党建新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在十三大,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为我们指出了这条新路的轮廓。

第一,党的建设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延安整风和建国以后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建设的成效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党能否正确地规定自己的中心任务,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来决定的。政治

路线问题,是关系党的建设的方向性、全局性的问题。政治路线不同,就会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各方面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党从1921年创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了20余年的曲折斗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终于牢固地确立了合乎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由此带来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大发展。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即将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趋势,及时提出,在取得胜利之后,党的建设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⑮。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的事实,正确地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党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也不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去适应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⑯。这个根本的拨乱反正要求党的自身建设彻底扭转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左”倾错误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件事,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全面、准确地表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基本内容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光明的前途,反之,不论是从右的方面,还是从“左”的方面偏离党的基本路线,都会重新导致党的建设的重大失误。这一点,也已为十多年党的建设的实践所证明。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⑰。这确实确实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

第二,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整个党的建设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因此,只要我们切切实实抓好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

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就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而避免大的失误。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只要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充分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并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我们就一定能做好这项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一个党内外结合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外有阶级敌人围剿、迫害的巨大压力,内有追求革命理想的强大动力,比较容易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凝聚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在执政和长期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外部的压力没有了,内在的动力也明显不足,党内容易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涣散倾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领导失误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除了要求我们党对全体党员和干部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外,还要求党自觉地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机制,使党时刻处在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使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时刻处在党员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使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纠正和严格制裁。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根据当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把内部教育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的主张。他把这种内外结合的对党的制约,形象地称作“内外夹攻”。指出:“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党思想。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肩负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党的领导人进一步强调了自觉接受来自党内外监督的重要性、迫切性。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前后曾反复讲了这个道理。他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⑯

在执政条件下,从外部对党的监督制约,主要通过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来实现;党内的监督制约,主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来实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正确指出的:“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⑰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以后的20年里,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我们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集中,民主太少。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地位、党员群众作为党内权力主体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都无法真正实现。这是我们党在领导工作中发生失误,党内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的经验说明,离开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离开了对党、党的干部和党员广泛而严格的监督制约,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难以取得成效。

扩大和发展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对党组织和党员实行有效监督制约,一定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证、落实。只有健全党和国家生活中体现民主集中制原

则的各项制度,才能使党内的民主监督走上经常化、规范化的轨道,才不致由于“小民主”的不足而引发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对此,过去我们在很长时间里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分析和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时,偏重于从思想认识、思想方法和个人作风方面去寻找原因,很少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的缺陷方面去考虑;较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反复进行的运动去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素质,打击歪风邪气,较少从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方面,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方面着手。这就使我们未能更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未能更全面地探求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刻洞察力,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深刻地说明,与个人的思想、作风相比,“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党内外民主生活,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路,很快地为全党所接受。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思想教育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继续坚持了这一主张,多次强调“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制度”。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国务院制定行政监督法规,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拟定党内监督条例^②。

综上所述,经过建国40多年来的曲折探索和反复比较,我们党已经逐步认识和初步开辟了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其特征是: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以思想建设为基础,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并使之不断完善,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克服缺点,焕发活力,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前进道路上任何风浪的考验。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5、790、1008、997、281、1328—1329、1318—1319、768页。

④《回忆与研究》(下)第479页。

⑤《延安整风运动》第30—31页。

⑥⑦⑪⑫《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4、201—202、296、293页。

⑬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5、10页。

⑮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6、120页。

⑰参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5—226页。

⑱⑲《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3页。

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